



新編
语言的故事

“知识富豪”的社会义务

——序《新编语言的故事》

李宇明

上学,也叫读书,因为上学就是读书。但是我,也许可以说我这一代人,曾经经历过上学没书读的时期。

我老家地处豫南的穷乡僻壤,方圆几十里没有出过大文化人。小学和中学时代,除课本外几乎就没有课外书。初中和高中,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学校的图书室本无多少藏书,那时也贴上了封条。偶尔能从学友处借得《烈火金刚》《保定外围神八路》《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之类的小说,也只能躲到宿舍里伴着灰暗的煤油灯偷偷地贪婪地阅读,常常熏得两鼻孔都是煤油灯的烟墨,但感觉却如同偷吃“禁果”。

1977年,是20世纪教育史永远都会提到的年份。那年恢复了高考,我侥幸跨入大学门,但仍是没有什么书读。上课没课本,老师讲,学生记。暑假、寒假常不回家,从图书馆借来“文革”前出版的文学史等教科书,一部一部地抄下来。后来书店开始有书卖了,像王朝闻的《美学概论》、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大家听到新书消息,夜里三四点爬起来,

跑到书店门口排长队。拿钱买了书，嘴巴得受苦，两三天得忍着只吃馒头不吃菜，但心里却洋溢着幸福。

我现在仍然认为，饥饿能够产生幸福感。肚子饥饿，有点吃的就幸福；精神饥饿，看本小说、看场电影就幸福。

就是在这种“幸福”中，我买到了一本名为《语言漫话》的书，1981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用报纸包上书皮，凑着桌沿在书脊上写上书名，翻开扉页写上某某藏书、何时何地购书等字样，然后就幸福地读起来。书中语言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并使我对枯燥的语言学产生了兴趣，以至于后来走上语言学道路。

后来才知道，写这些故事的，竟是我国屈指可数的一批语言学家，发起者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于根元、张朝炳、韩敬体、杨耐思等先生。他们当年在班车上聊天，希望为青年人写点东西，激发他们学趣，点旺事业薪火。坐而能谈，起而即行。1980年出铅印本《语言的故事》，之后改名《语言漫话》出版，之后复名《语言的故事》重版。现又约人写成《新编语言的故事》，以崭新面目再次面世。一部讲语言故事的普及读物，三十余年不断修订再版再写，有人珍藏而不弃，还引导多人走上学术研究道路，奥妙何在？

语言乃人类须臾不能离开之物，语言能力乃人类最为重要之能力。人人对语言熟悉而充满兴趣，言谈交际中常常迸发出语言智慧的火花。看看现今的网络语言和网民行为，就知道人们对语言兴趣有多浓厚，人们的语言智慧有多发达。而故事，是最具魅力的通俗文学，用故事讲语言，自然是闻者喜见者乐，有读者，有销路。此可谓奥妙之一。

语言学曾被人称为玄学，也有人说是无用之学。北京女作家叶广芩，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采桑子》，之后拍成电视连续剧。小说讲述满族贵胄后裔民国以来的生活，有一人物是金家二格格，其子女有教员，有工程师，还有个当了语言研究员，都被人嘲笑说是“啃死工资的穷酸”。语言研究员作为“穷酸”的典型之一，虽是小说，也窥露出社会的态度。做语言学也许苦些、穷些，但语言学对社会确实有用。有位市教委的朋友告诉我，她在澳大利亚的女儿要生孩子，而她恰好刚退休，就去帮女儿带孩子。母女俩有个困惑，不知道让刚出世的小家伙先学好汉语呢，还是先学好英语？其实她们这是在做家庭语言规划，语言学能够帮她们解困释惑，做出合适的语言规划。语言学有用，这本用故事讲语言学的书，自然就有历史的延伸力。此可谓奥妙之二。

科学知识的社会化，就是科普。科普不是谁都能做、谁都能做得好的。要把专业性很强的科学知识通俗地讲出来，实非易事。《语言的故事》是大家做科普，讲得生动，说得到位。讲得生动能吸引人，说得到位就读后有得。此可谓奥妙之三。

2010年9月，媒体热炒世界两大巨富比尔·盖茨、巴菲特来中国，将与50名中国富豪共赴“慈善晚宴”，有人承诺死后“裸捐”以响应“巴比宴”，有人担心“劝捐”而惧怕“巴比宴”。一时间，有了财富应如何回馈社会，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这使我联想到知识分子的社会义务。知识分子是知识拥有者，高级知识分子是“知识富豪”，知识富豪如何用知识回馈社会，尽社会义务，也是值得思考、值得议论的。

《语言的故事》和《新编语言的故事》的作者们，用行动给出了他们的

新编语言的故事

答案。我们应当向这些语言学的“知识富豪”学习。

2011年10月29日

序于北京惧闲聊斋

唤醒沉睡的语言

中国传媒大学 于根元

许国璋先生在《〈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中国语文》1991年第3期)里介绍《马氏文通》后序首段的一个思想：“世界上一切人种，不论肤色，天皆赋予心之能意，意之能达之理。”并且认为这“叫人想到今人所谈语言是‘与生俱来’的(innateness)学说”。许国璋认为这个论说，“今天的学者耳熟能详。然则马氏在一百年前得现代语言理论风气之先，是中国语言学的骄傲”。我赞成马氏和许氏的这个思想。

有的人遇到意外，他原有的一部分生活的记忆沉睡到大脑的深部去了，跟这部分生活的记忆有关的一部分语言也沉睡到大脑的深部去了。这部分语言唤醒的时候，跟这部分语言有关的生活的记忆也唤醒了。

早的时候，我看过一部电影叫《鸳梦重温》，是说一个人总觉得他忘掉了一段重要的经历，他很痛苦，他总在苦苦地把那段他觉得原来有的记忆找回来。1997年秋天我跟我的几个硕士生谈起这件事，我那时候的硕士生黄晓蕾说：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成年的时候出版了小说《机缘》，在西方很畅销。1942年美国好莱坞拍成电影，著名演员罗纳

德·考尔曼和格丽尔·嘉逊主演,在我国多次上演,叫《鸳梦重温》。黄晓蕾把小说的有关内容给我整理了出来。

小说写这样一件事。一战期间,一名年轻的英国步兵上尉瑞纳在战争中头部受重伤,失去知觉,成为德军俘虏。他苏醒后失去了对自己身世的记忆。后来,通过俘虏交换,他被移到英国精神病院治疗,受尽折磨。1919年停战日那天,他溜出医院,得到一位闯荡江湖的女演员波拉的同情。经波拉悉心照料,逐渐恢复健康,但是受伤前的生活对他来说仍是一片空白。两人婚后寄住伦敦一位牧师家中。瑞纳靠写作为生,生活日渐好转。半年后,他去利物浦一家报社跟一位编辑洽谈,途中被汽车撞倒,造成昏迷。苏醒后,恢复了对战前自己身世的记忆,却又忘掉了跟波拉同甘共苦的那段生涯。

他返回自己原来的家园,先入剑桥大学学习,后来又协助振兴家业,成为工业巨子和议员。但是他总觉得自己有三年生活经历在记忆上是段空白,为此怅然,郁郁寡欢。他竭力追忆思索。这期间,波拉改名汉斯莱小姐,一直在瑞纳身边做秘书,默默地等待他恢复记忆。由于汉斯莱小姐聪明能干、细心体贴,在事业上的协助,几年后瑞纳娶汉斯莱小姐为妻,但是他不知道汉斯莱曾经是他的妻子。

20年之后,二战爆发前夕,由于偶然的机,瑞纳记忆的闸门突然被撞开。他沿着从精神病院出走后的路,追寻故人,凭吊旧址,终于同波拉鸳梦重温。

小说对瑞纳失去记忆的描写很特别。下面两段话是瑞纳对自己记忆能力的描述:

……我有时觉得自己——如果这样说不算太荒谬的话——自己有一半是另外一个人。一些琐碎的事儿——一种声调啦，一股香味啦，报纸上的一个名字啦，看见一样东西或者一个人啦，都会叫我想起点什么来——可是那到底叫我想起什么，我至今都没来得及抓住！——这是记忆里的一星磷火，在它消失之前又没法让人捕捉到。

哦，对了——只是一幢四间房间的工人住所——那样的房子何止万数。

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们站在门口等待开门，我可以看见客厅窗户上的纱窗后面映出壁炉里熊熊的黄色火光。这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可是——很难形容我当时的感觉，就仿佛那所房子正在等待我——欢迎我从黄昏寒冷的户外走进那温暖如春的炉火光亮中去——一种回归家园的气氛。

下面这段是一位心理学专家对瑞纳失去记忆的分析：

我一直期望他的记忆力最终会全部恢复——这儿一点，那儿一点——最后像一把开锁的钥匙，或者像拼花板玩具的最后几块，整个画面一下子显现出来。不过我猜想这种情况尚未发生。

下面是瑞纳最终恢复记忆的描写：

我瞧着他的眼睛，尽量不激动地说：“您现在就跟我第一次见到您凝视着一座山那个时候一样，因为您觉得自己认出它——停战纪

念日那天，您当时坐在火车里朝窗外眺望。”

“停战纪念日，”他重复道。接着他轻声又近乎信口而出地说，“我当时正在医院里……我指的是第一个停战日——停战那天。真正停战那天。”他忽然抓住我的衣袖。“是啊，我记起来了——我当时是在麦尔伯里！”

“麦尔伯里”，像一把开锁的钥匙，像拼花板玩具的最后一块，瑞纳一想起这个地名，他那段遗忘的记忆的整个画面一下子显现出来了。

电影的情节有些改动，特别是瑞纳恢复记忆的过程：瑞纳很意外地来到他失去记忆时候住过的小镇，重温了过去的街道、楼房、商店，特别是来到了他和波拉曾经住过的小屋前。沿着院子的门进去，很自然地拿出口袋里的钥匙。这串钥匙他总是带在身上，他不知道它从何而来，他只是凭感觉认为它很重要。他去开门，这时候从背后响起了波拉温柔的声音：“门锁锈了，该上油了。”他们住在这座小屋的时候门锁锈过，波拉说过这样的话。瑞纳终于想起来了。

波拉温柔的声音：“门锁锈了，该上油了。”像一把开锁的钥匙，像拼花板玩具的最后一块，瑞纳一想起这句话，他那段遗忘的记忆的整个画面一下子显现出来了。这一句话的被唤醒，唤醒了瑞纳好多年生活的记忆，唤醒了他半个生命，或者说把他这半个人跟那半个人合起来了。

中国的文艺作品里也有类似的情节。我说到电视剧《刘老根》里的有关情节，我那时候的博士生刘艳春又看了光盘把有关情节给我整理了出来：

电视剧《刘老根》(二)第19集说:刘老根用龙泉山庄做抵押从银行贷了3000万元,派许嘉去南方订购建葡萄酒厂的设备。许嘉半个多月没有音讯,刘老根觉得不妙,去银行查对,这才知道自己的汇票是假的,龙泉山庄中了圈套,遭到了暗算。他喝了几杯闷酒,大哭起来,刘老根疯了!后来,他醒着的时候,拿剪子绕着头、后背,剪所谓缠在身上的钢丝,不停地剪着,剪着……刘老根不会说话了,别人对他说话,他都听不见,别人要他吃喝一类的话或许他还能听得见,或许也听不见,理解的是别人的体态等的意思,因为他连女儿山杏哭着叫他爸爸他都没有反应,他大概连爸爸是何物都不知道了,他几乎成了废人。

第22集说:丁香这时候跟刘老根结婚了。

洞房之夜,丁香说:“……你不明白拉倒,我明白就行,我等你20多年了,唉,今年整整23年了,23年等回来一个疯子。……”刘老根依然剪着,剪着……丁香唱起了《王二姐思夫》:“我闷坐绣楼,眼望京城思想起二哥张相公。”刘老根不剪了,剪子在手中不知不觉合上了丁香唱的二人转的节奏。丁香停下来,刘老根也停下来,继续剪着,剪着……丁香继续唱:“二哥他进京赶考,一去六年整啊,人未回来,信也未通。”从“人未回来”处,老根又开始剪着剪子应和着节奏。丁香停,老根也停,还是剪着,剪着……

这时候丁香很平和地问:“你爱听我唱啊?”刘老根不回答,继续剪着,剪着……

丁香大段地唱：“二哥你走一日，我墙上画一道呀，你走两日我墙上画一双。二哥你一去六年整，我横三竖四画满墙。王二姐泪悲啼呀，从外边跑过一群鸡，公鸡它在前边儿咕咕地叫啊，它咯儿了咯儿了叫母鸡。可叹那连毛的畜生都有疼妻的意呀，可是你刘老根儿不认你的妻呀。”这一段里，丁香唱，刘老根用剪子应和着节奏，丁香停，刘老根也停，又想绕头剪唱到末尾一句，丁香流下了眼泪。

丁香顿了顿说：“老根儿，咱俩年轻时唱的那个——”丁香唱道：“工地上人欢马跃，红旗展哪。”丁香用手打着拍子，老根剪着剪子应和。丁香唱：“社员们——”刘老根开口接着唱起了：“改土造田热火朝天哪——”丁香唱：“姑娘们挑着土篮儿一路小跑儿哇——”刘老根唱：“小伙子抡起大镐劈掉半拉山哪——”丁香唱：“出大力流大汗为的是夺高产——”刘老根唱：“为革命做贡献我累点儿也心甘哪。”这时候丁香喊了一声：“老根！”把刘老根的剪子抢下，激动地说：“我是你媳妇儿，我是丁香，你认不认识呀！老头子，你好了，你好了！老根儿呀，你这病能治了，老根儿，你能好！”丁香抱住刘老根，悲喜交加。老根被唤醒了。电视剧里响起音乐……第二天一早，老根和丁香、山杏从房中出来……刘老根已经好了。

刘老根疯了的时候，他原有的生活记忆和语言几乎都沉睡了，留下了些许感应点。丁香关于思夫的一段唱，碰到了他的一个感应点，但是这个点的感应信号太微弱。后来丁香关于同刘老根年轻时候跟青年男女一起无忧无虑痛痛快快劳动建设家乡的一段唱，碰到了刘老根最关键的感应点，刘老根向往劳动，向往做事，但是要无忧无虑痛痛快快。丁

香这一段唱唤醒了刘老根大脑里原有的那段唱和与此有关的生活的记忆,唤醒了刘老根与此有关的生活记忆的语言。

中国电影《非常爱情》《足球大侠》和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也有类似的情节。

许多语言学家说人的语言是与生俱来的。原始人以来的语言积淀在现代人的身上了。人们后天学习语言其实是唤醒已经积淀了的语言。我也赞同这样的说法。如果正是这样的话,我们现代人实在是个大富翁,我们拥有了原始人以来的人类的语言的积淀。不过积淀里好的跟不好的我们都继承下来了,继承下来的都是在我们大脑深部沉睡着的,要一一唤醒。我们清醒的人也有许多语言是在我们大脑深部沉睡着的,要不断一一唤醒。人们相互用语言交际,都是在彼此进一步相互唤醒语言。彼此要像波拉唤醒瑞纳、丁香唤醒刘老根、亲人同事朋友等唤醒海若那样,充满爱心、耐心,找到对方最灵敏的感应点,用高层次的语言唤醒高层次的语言。我们的语言教师,更是要充满爱心、耐心,找到对方最灵敏的感应点,用高层次的语言唤醒学生高层次的语言。因为,唤醒高层次语言的同时,一定意义上是唤醒了高层次的生命。

我更赞成“语言全息发展论”。关于发展——充而用之,来自孟子的启发。《孟子·公孙丑上》接着“人皆有善”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十三经注疏》下册 2691 页,中华书局,1980)这一方面是人的能动,比一般的后天激活或者唤醒还积极一些。加上事物不完全是预先规定好的,是留了改变、发展的余地的。

卖花女的故事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孙曼均

卖花女伊莉莎·杜利特尔容貌美丽，聪明乖巧，却家境贫寒，言谈粗鲁，讲一口粗俗的伦敦西区土语。她每天到街头叫卖鲜花，赚点钱补贴家用。一天，她与语言学家希金斯教授在避雨时偶然相遇，伊莉莎甜美的嗓音引起了希金斯的注意。教授夸口，他能教伊莉莎说真正的英语，使她成为操着贵族口音、出没于上流社会的千金小姐。教授的朋友皮克林上校和他打赌，如果伊莉莎以贵夫人的身份出席6个月后举办的大使游园会而不被人识破真相，那么皮克林愿意承担一切试验费用。希金斯教授欣然接受挑战，他从最基本的字母发音教起，对伊莉莎开始了严格的训练。

6个月后，希金斯满怀信心地带伊莉莎和皮克林一起出席希腊大使举办的招待会。当伊莉莎出现在大家面前时，人们纷纷停止了交谈，伊莉莎温文尔雅的话语和高贵优雅的举止深深吸引了在场的每一位宾客。希金斯教授终于成功了：一个乡下女孩变成了雍容华贵的上流社会名媛。希金斯教会了伊莉莎语言、风度和气质，使她认识到了自己的价

值；而高傲的希金斯也被丘比特的箭射中，爱上了他所造就的小姐。

这是1964年由华纳公司投资拍摄的好莱坞电影《窈窕淑女》中的故事。奥黛丽·赫本扮演伊莉莎。华美的布景、豪华的服饰、优美的画面、令人心驰神荡的歌舞以及奥黛丽·赫本的精彩表演，使这部电影有如诗般美丽，感动了亿万观众，赢得八项奥斯卡大奖，成为音乐电影史上的不朽杰作。

电影故事的情节看似荒诞不经，其中却蕴涵着语言学知识。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存在着各色各样的人群，他们由于性别、年龄、职业、阶层、生活方式、文化水平、宗教信仰、社会地位等的不同，或由这些因素构成的社区交际习惯的影响，形成了各种小团体，在这些小团体中会自然地或人为地出现一些特殊的语言成分，这就是语言学所说的社会方言。社会方言是语言分化的结果，是同一种语言因社会的社群分化而表现出的小社团用语，是某一社会团体或者某一社会阶层通用的语言。社会方言并没有独立的语言系统，因此，一般情况下，社会方言并不会妨碍人们之间的交际。但是，在语言风格、表达方式以及一些特殊词汇的使用上常常呈现出种种差异，最常见的差异主要是在词汇方面，其次是发音色彩。我们常说，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透过一个人使用的语言，如发音、用词、用语风格等，我们可以推测这个人所受的教育、所从事的职业甚至所属的社会阶层。一般说来，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常表现为说话得体、谈吐文雅、用词准确、表达流畅，而言谈粗俗的人则多被视为缺乏文化教养。一个人所使用的社会方言往往能够透露出说话者的年龄、性别、职业、

阶层、文化程度、宗教信仰、社会地位等社群特征。

在社会方言中最易引起人们注意的便是行业语，不同行业之间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各行各业由于交际的需要会使用一些专门的词语。如电影行业的“蒙太奇、推、拉、摇”等，教育行业的“下课、下班”等。这些行业语虽然很常见，但它们是行业的内部交流语，有着与共同语不相同的特殊意义，若没有专人解释，外人很难猜明白。比如，当你看见一位老师早晨从家中出来却说去“下班”时，你可能会以为这位老师是否说错了话。如果这样认为，那就错误理解了这位老师想表达的意思了。教师行业里所说的“下班”，特指早晚自习等下到学生班级，对学生们的学习进行监督或辅导，这个含义和社会一般用语中的“下班”有着明显的区别。行业语虽然是某个行业集团的专门用语，但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行业与社会生活关系的密切，一些行业用语逐渐具有了广泛性，引申出新的意义，从而成为许多人熟悉的普通词汇。例如，“资本、麻痹、感染、折扣、折射、副作用”等原先都是行业用语，现在都已为大众熟知。

隐语和黑话也属于社会方言，它们是某些社会集团为了隐蔽本团体进行特殊活动而创造的只有内部的人才懂的特殊用语。说到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和电影《林海雪原》，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侠客般的杨子荣孤身入匪巢、智剿威虎山的传奇故事，更是被人们代代相传。杨子荣在威虎山上与匪徒过招，问答之间皆是黑话。上山途中一见匪徒，匪徒就用黑话“蘑菇，溜哪路？什么价？”（什么人？到哪里去？）来盘问。杨子荣用黑话跟土匪一问一答，滴水不漏。土匪以为是同伙，带他去见

座山雕。座山雕一见，劈头便是一句：“天王盖地虎。”（你好大的胆！敢来气你祖宗。）这是匪徒中最机密的黑话，只见杨子荣按匪徒们回答这句黑话的规矩，从容地把右衣襟一翻，答道：“宝塔镇河妖。”（要是那样，叫我从山上摔死，掉河里淹死。）正是由于杨子荣流利的对答，才取得匪徒的信任。

又如，因性别、年龄等的不同而形成的“女国音”，就是北京青春期女性口语中流行的一种特殊的发音现象，其特点是将一部分在标准北京话里应读团音的字的发音位置前移，读成尖音；即当韵母是 i 或以 i 打头时，把舌面音 j、q、x 读作舌尖前音 z、c、s。如把“界限”读作 zìesiàn。这种特殊的发音现象常见于受过一定教育、操普通话或北京话的青春期女性人群，尤其是女中小学生，在男性、青春期以前的儿童以及中年以上的女性中则罕见，故称之为“女国音”。“女国音”作为北京话里的一种口音，也属于一种社会方言，是一种主要出现在北京地区、仅见于特定性别和年龄人群的语音现象。

英国广播公司(BBC)所使用的英语发音作为通用语在全英国广播，这是标准的伦敦音，这种标准的伦敦音是受过良好教育并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象征。卖花女伊莉莎说的是方音，说话也不很得体，显得比较粗鲁无礼，这表明她出身贫寒，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在希金斯教授的训练下，伊莉莎通过模仿和练习，不仅学会了“贵族口音”，也学会了得体的谈吐，当然还学会了得体的举止与装扮。尽管伊莉莎的身份并没有改变，却因“上流社会的语言”而以假乱真，实现了麻雀变凤凰式的蜕变。当代作家谌容在中篇小说《人到中年》（《收获》1980年第1期）里，

塑造了一个装腔作势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的艺术形象。小说用白描手法，描写了她在医院里的表演：看病，她点名要最好的医生，还必须是共产党员，否则，“让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夫给焦部长做手术，这是不是有些考虑不周”；动手术，她要求组织专门的手术小组，制订手术方案，否则就是轻敌，“轻敌思想往往造成失败，这是我们党历史上有过的”；治疗，她要求医院保证不出问题，否则就是没有“对革命负责，对党负责”。她的话语总是充溢着革命的词语、冠冕堂皇的理由和貌似亲切的语气。她开口就是“我的同志呀”，满口都是“应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家都是革命同志”等假话、空话、套话。秦波的语言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一种典型的社会方言——“官腔”。作者通过对特定人群使用的“官腔”加以选择、提炼和加工，概括出这一群体在语言表达上的共同特点，塑造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具有群体本质特征的典型人物形象。

看来，语言不愧为人的“第二张面孔”。它既是一个人性、品性、身份等诸多社会信息的自然流露，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而改变。